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党史资料. 第 38 辑 /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室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10

ISBN 7-218-04634-7

I. 广...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史料 - 广东省 IV. D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030 号

责任编辑	卢权刘坤仪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634-7/D · 558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专题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控制与“大跃进”运动	王 涛 (1)
党成立初期广东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 … 卢 权 褚倩红 (21)	
“文革”期间广东的“五·七”干校纪略 …… 叶文益 (58)	
60 年代的广东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杨 建 (77)	
汕头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 傅锦章 (97)	
梅县国民经济调整 …… 古锡桢 林柿华 (111)	
兴宁国民经济调整 …… 柯干雄 (122)	

历史回顾

一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	
——缅怀莫雄和项与年同志的崇高奉献精神	
…… 万 正 石青野 (133)	
吴仲禧任南京国防部中将搜集蒋军情报内幕 …… 王光武 (140)	
海陆丰苏维埃 75 周年之忆 …… 王 曼 (154)	
我的革命经历及几个难忘的关节 …… 李福海 (159)	

专题史料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党团组织建立 …… 晁 云 (187)	
--------------------------------	--

胡绳的又一篇佚文

——《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曹**摇**直（192）

孙中山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立场

——略述与右派作斗争的过程……………张**摇**竞（201）

解放战争时期三罗地区武装斗争胜利的关键……………伍伯坚（221）

漠阳山区在武装斗争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贡献

……………钟万全（237）

学术研讨

新中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社**摇**涛**摇**叶**摇**宇（255）

六十年代初粮食政策调整浅析……………周艳红（265）

邓小平价格改革理论的历史地位……………欧大军（275）

史实考证

新中国建立时间的变迁轨迹……………钱听涛（300）

人物述林

尚仲衣教授传略……………张泉林**摇**连**摇**珍**摇**洪**摇**流（309）

记陈汝棠夫人李素真……………林汉英（326）

党史工作

关于征研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的情况……………刘子健（334）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 控制与“大跃进”运动

王 涛

“大跃进”运动时期，“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差，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中国社会由局部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逐步转入了局部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状态。1957 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控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大跃进”运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与“大跃进”运动

（一）党和国家政权中的不和谐现象

1. 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削弱

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削弱，人大代表难以畅所欲言。这主要受 1957 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影响。在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党发动群众提批评、建议。但“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

进。”^①不幸的是，这种“反击”却严重扩大化了。甚至连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在宪法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提出的一些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被当作右派言论加以批判，人大代表难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

另一方面，党政不分现象在加剧。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这样，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变成了直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2. 党内民主生活的扭曲

1957年后，在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遭到破坏。1957年底到1958年，开展的对反冒进的批判，“标志着建国后，党内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党内气氛逐渐紧张”。^②这场批判，是毛泽东直接主持发动的，以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为批判对象，否定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同时，滋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除了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这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从1958年起，他开始超越中央政治局及其他常委之上。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在全党范围内的开展，更加严重损害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内民主生活。在中央，毛泽东可以不与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商量，个人就可以作出重大决定。在地方，党委第一书记的意见可以代表党委集体的意见，甚至任何事情都必须经第一书记拍板，形成了

书记“一言堂”的状况。

3. 人民公社的建立

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乡政权合一的农村基层单位。1958年7月，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得了早有类似设想的毛泽东的肯定。8月上旬，他强调，“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③8月29日，北戴河会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靡全国。仅仅4个月的时间，全国建起26000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99%以上参加了公社。^④人民公社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政权单位。

（二）社会强控下的“跃进”

1. 中国跳上“跃进”战车

从1957年9月至1958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一系列旨在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会议。其间，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上线过高的批评。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并警告，今后不准再提反冒进。实际上，等于立了个“只能反保守不能反冒进”的政治规定。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要冒进，要大冒进。而冒进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跃进”，这就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 = 跃进 = 马克思主义。^⑤这样，谁坚持比例平衡、协调发展就是“右倾保守”，就应当受到批判。而调子唱得越高越好，计划越脱离实际越好。在这种气氛中，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都拟订“跃进”计划，并且指标层层加码，不受约束。这反过来又坚定了毛泽东对“大跃进”

的信心和发动“大跃进”的信心和决心。

在人民代表大会权力受到削弱甚至忽视的情况下，“大跃进”运动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讨论，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还批准了定有粮棉、钢铁等产量的高指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2. 在“跃进”轨道上狂奔

“大跃进”运动的高潮是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标志。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可毛泽东决定的“1070万吨钢”的指标，并号召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不是没有人觉得“1070”难以实现，只是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难以提出。据薄一波回忆，“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作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把钢指标提高。”^⑥

在人民代表大会权力削弱的情况下，钢指标没有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讨论便向全国推行，使钢指标的制定，又少了一层监督环节。在“一元化，党政不分”情况下，为了保证钢铁任务的完成，党中央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中央9月25日的电话会议上，一再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战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用党的纪律，保证“大跃进”的实现。他认为，在大炼钢铁中“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⑦会后，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人民公社的建立，一方面使农村的公共资源自下而上集中，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由党组织又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以致公

社书记可以任意支配农村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使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具有了“准军事”性质，即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再加上公共食堂的普遍推行，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对农民的空前控制，农民自由活动空间更加狭窄。“政社合一后，人民公社的行政命令，较之原来政府机关的行政命令要严厉得多，也方便得多，因为社员吃饭在食堂，吃饭权操在干部手上，如果碰上了不正派的干部，你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很合意，他就可以剥夺你的吃饭权，叫你以至全家挨饿。”^⑧这就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之风、瞎指挥之风。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之初，不可否认，人民群众确有一股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热情，但随着运动的持续发展，群众热情逐渐消减。这时，人民群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来驱动的。

3. 中断纠错，在“跃进”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在“大跃进”的纠错过程中，毛泽东居于支配、决定的地位。党内其他领导人、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想对决策产生影响，必须影响到毛泽东的认识；反之，则不可能有什么效果。这决定了纠错过程的脆弱性。在运动之初，毛泽东就告诫党的干部，“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⑨在“大跃进”高潮中，伴随着批判各种倾向的斗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印象：只要是属于“大跃进”运动的就是好的，只准拥护，不能反对。当“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时，迫于形势，很少有人敢提出意见和建议，即使有人敢提出，也极少有人响应。当毛泽东提出1070万吨钢指标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贾拓夫认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许多人听不进他的意见，更不能作为一种意见送达毛泽东考虑。^⑩在“大跃进”运

动中，不是别人看不出问题，而是只有毛泽东才能没有顾虑的“发现”错误，率领全党全民纠正错误。这就造成了“毛泽东带头犯错误，又带头纠正”的现象。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纠正了在所有制、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作风、分配制度、指标等问题上的错误。但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纠“左”，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作为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纠正的，是从10年、15年或再多些时间赶上美国，并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战略目标，来纠正比这更性急的“左”倾路线。纠“左”的目的，恰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早作准备。毛泽东认为，1958年上半年各方面的问题大体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种认识，限制了纠错的深入进行。尽管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多次强调“不要务虚名而处实祸”，“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①然而，一旦有人突破了毛泽东的认识，突破了毛泽东纠“左”框架，结果只能处实祸，言者有罪。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时，突破了毛泽东的纠“左”框架，毛泽东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不仅给彭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而且中断了纠“左”进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被指出的问题，仿佛又不成问题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庐山会议期间、之后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更为严重破坏，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之风，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使泛滥再起的“左”倾错误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难以在纠错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当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努力纠正“大跃进”错误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通过一些反映纠错成果的一些决议。1959年4月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除粮、棉外的，各项主要指标有较大幅度降低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的时候，全国人大照此办理。1960年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确定了根本不可完成的高指标。

在纠错过程中，人民公社除在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稍有改变外，基本保持原来的对基层群众的控制状态，再加公共食堂等“有利于过渡的共产主义因素”还在坚持，农民不愿也不敢公开地反映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反右倾斗争后，又把那些对“大跃进”运动不满的言论当作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更无人敢言了。人们只有听任“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展下去，以至后来酿成巨大的恶果，在信阳等地区，居然出现了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⑫

二、法治弱化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一）法治受到冷遇

1957年后，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否认法治，称赞“人治”。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他还说，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

都自觉了，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⑬刘少奇则提到，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还是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⑭对毛、刘的这种观点，党内无人有异意。会后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影响了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和全党大多数党员的认识。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中央政法小组认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⑮

（二）“人治”下的“大跃进”运动

根据1954年宪法精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闭会期间，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讨论和决定。^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削弱的情况，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发展以至高潮铺平了道路。未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讨论，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⑰同种情况下，如前所述许多高指标，没有经过人大讨论，便直接布置下去。

在法律受到蔑视的情况下，强迫命令风在全国范围内盛行。“在实践中，破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乱抓人、乱捕人的现象从1957年开始盛行起来。”^⑱人民公社建立后，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⑲在反右倾斗争后，强迫命令风更加严重。在信阳、许昌等地区，社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做法竟有：捆绑、吊打、辱骂、非法组织辩论和斗争、体罚、停止社员吃饭、搜查、人身侮辱、啃吃草、熬夜、学鳖叫、驴打

滚、罚款、蹲在厕所闻臭气等几十种。^②法律难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使强迫命令风得以盛行，而且助长了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风气，造成了严重后果。以信阳地区为例，1958年夏，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河南遂平嵇岈山人民公社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这是假的就会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③1959年下半年，在信阳地区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信阳地委继续反“右倾”和反“瞒产私分”，而且不顾群众死活，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还无视人民的通信自由，通过邮局非法检扣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对中央和省委封锁消息，^④这使得信阳地区缺粮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了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恶劣后果。

法律被抛到一边，靠什么来维持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党的决议和政策就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秩序。^⑤但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党的决议和政策，失误的机会较多，以它们维持社会秩序，是靠不住的。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7月底，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则达9000多万人。^⑥加上其他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运动的劳动力超过1亿。由于全民大炼钢运动及其他各种大办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使1958年秋季出现了农作物丰产不能丰收的局面。

三、畸形反馈机制与“大跃进”运动

（一）畸形反馈机制

在 50 年代中期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严重扩大以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既然你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就是反革命分子；既然你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你的意见就是反革命意见；既然你发表反革命意见，我们就要实行‘舆论一律’，取消你的发言权。”^⑤人们为求得安稳和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隐藏起来，甚至附和领导的意见，从而使领导的意见轻而易举成为“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人们所能听到的都是符合领导意见的舆论，下面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掩盖起来，领导凭据自己的意见决策，难免会产生失误、发生错误。当决策出现错误之时，领导又凭片面的或残缺不全的信息决策，错误就难以得到及时纠正。^⑥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规模应用又使上述情况愈演愈烈，1957 年反右斗争中，“四大”被用作斗争的主要武器，曾伤害了一大批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四大”适合群众斗争、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内容。名义上，“四大”是让人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实际上它却常被用来进行人身攻击，言论自由因而遭到残酷的践踏。再则，由于实行舆论一律，“反革命分子”没有运用“四大”的权力和自由。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局面，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

（二）畸形反馈机制与虚假宣传

1. 《人民日报》与“大跃进”运动

其一，《人民日报》推波助澜。

在“大跃进”发动时期，八届三中全会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机关报上第一次提出“跃进”口号。此后，《人民日报》为“大跃进”运动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舆论宣传活动。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12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论证了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重要性。在这种舆论宣传背景下，1957年冬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揭开“大跃进”序幕。1958年初，《人民日报》又为“大跃进”理论作宣传，推动“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论证了“大跃进”的必要性。195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宣传了实现“大跃进”运动所采取的所谓“积极平衡”的方针。1958年春，在“跃进”口号越来越响的情况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

《人民日报》推动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白热化发展。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北戴河会议决定生产1070吨钢的同时发表社论，认为“不但一定能完成，而且一定能超额完成。”此后，为了推动全国各地全民大炼钢，《人民日报》又介绍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人民日报》发

表了《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极力宣传土法炼钢对钢铁产量翻番的意义。《人民日报》发表了《贺武钢出铁》、《祝河南大捷》、《禹县怎样做到日产生铁四千吨》、《祝广西大捷》、《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等文章，介绍这些地区大炼钢铁的“成功经验”……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规模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钢铁指标，只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就能完成。而且，有的地方不仅已完成指标，甚至超额完成了指标。这种舆论宣传，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在各地采取评比方法时，尤其如此，从而使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持续发展。人民公社运动同样也伴随着《人民日报》等媒体已经发表了一些鼓吹公社化狂热的宣传、鼓吹迅速发展。在北戴河会议前，《人民日报》等媒体已经发表了一些鼓吹公社化的文章，如《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带来的新变化》等文章。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极力鼓吹人民公社在发展农业生产，推动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社》、《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等社论，则鼓动各地迅速建立人民公社。同时，《人民日报》还刊出了《徐水人民公社颂》、《新人在成长起来》等，极力渲染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文章。这种舆论环境是人民公社很短时间内能在全中国普遍建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促成因素。

在“大跃进”纠错过程，《人民日报》又对纠错措施进行夸大实际的宣传。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步纠正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但还没解决“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党和政

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解”。^{②7}《人民日报》却认为这个决议，“透彻地解决了人民公社目前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政策问题”，这种宣传虽然一定程度有利于决议的贯彻执行，但实际上又压抑了人民群众纠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把纠错的任务，再一次寄托到最高决策者——毛泽东身上。最后，还是“毛泽东从视察中了解了”上述未解决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

在庐山会议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克服右倾情况，厉行增产节约》、《克服右倾思想，掀起增产节约群众运动新高潮》、《反右倾，鼓干劲，为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以及《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等文章，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的功绩”，批判各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这种舆论宣传，使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不长时间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发动起来，使“大跃进”错误继续发展。

其二，《人民日报》报道虚假信息，助长浮夸风。1958年初，《汕头报》等南方小报率先登出晚稻亩产超过3000斤的记录，当时在全国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影响。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加入浮夸的行列，形势就大不相同了。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嵒嵒山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530斤的“喜讯”。6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再次报道了这项高产记录，后经复打，亩产又增加了近300斤。实际上这些产量是20亩试验田的总和。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表大量社论，批判所谓“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和“农业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②8}宣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